

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邓颖超的一生始终自觉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严格恪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做人处事原则,从不随意夸大和粉饰,总是坚持“事实就是事实”,充分表现了胸怀坦荡、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不图名求利的优良作风和高风亮节,堪称一代楷模。



■ 晚年邓颖超在办公

《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新闻工作必须很细心,用眼看,用脑想,用事实求是的反映新闻,要不怕改进作风。

邓颖超

■ 邓颖超给《新闻记者》的题词

邓颖超 求真典范 务实楷模

孟红

坚持写文章要忠于史实

1976年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温宪当时正在值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周总理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温宪当即做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她说:“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写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周总理,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看。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

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他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到了伤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董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人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

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他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你们提法要一致,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邓颖超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特意提醒他们,“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

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邓颖超不仅对工作人员谆谆指导,而且处处给编撰工作提供帮助。十多年来,与周恩来相关的书籍的编辑出版,都凝聚着邓颖超的大量心血。当收到周恩来的有关文稿时,邓颖超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查阅,反复核实,及时退回。读了她退回的文稿,编撰研究人员无不为之认真的精神、细致的作风和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动和叹服。

例如,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由于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报告的记录稿,原稿的不少地方缺字漏字,特别是一些人名和史实不太清楚,整理时困难不少,是邓颖超帮助核定了不少事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建议。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邓颖超不但亲自挑选出周恩来曾经写给她的十多封书信,而且还提供了不少征集书信的重要线索,为编好这本书带来了不少方便。1979年,邓颖超在审阅周恩来关于大革命时期我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文稿时,两次打电话给编撰人员说,文稿中讲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北方只提于树德不够,建议加上李大钊和李锡九两个人的名字(邓颖超和李锡九在大革命时期都担任着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领导工作,在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中,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经常接触,彼此深为了解)。她说,那时我在北方,对北方党的情况比较熟悉,李永声(即李锡九)的工作很活跃,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希望李琦(曾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同志不要因为他是自己的外祖父而回避,应当尊重历史事实”。

除了审阅周恩来的文稿、发言稿外,邓颖超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纪念周恩来的有关文章也都认真阅读,提出过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

1982年4月,邓颖超在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著作生平研究组的几位同志时说:“你们不仅要研究恩来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还要研究中央其他同志的生平和著作,甚至研究党史、中国历史。你们文献研究室要注意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

邓颖超在听读了《周恩来传》的部分章节后,在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人员的信中,指出:“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她在阅读《艰难而辉煌的岁月》一文后,给研究室工作人员写去的信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只写了恩来同志保护党内干部,却忘记了写他还大量地保护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我几次外出碰到一些同志,他们都向我谈起如何受到总理保护才被解放”“从统战工作考虑,对大批党外人士的保护,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写上较为妥当”。

邓颖超的这些言谈举止突出表现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坦荡、实事求是、不居功、不图名的思想作风,令人肃然起敬、由衷钦佩。

低调做人的杜衍

晏建怀

杜衍是宋仁宗时期颇负盛名的贤相之一,资历深,口碑好。庆历七年(1047),杜衍上书请求挂印退休,得到了宋仁宗的批准。

杜衍为政清廉,平时从不营殖私产,以至于退休后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寄居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回车院。宋代各地都建有回车院,有的作为官员卸任后等待接任者到来的临时住所,有的作为驿站之用,相当于官员招待所。杜衍在回车院住就是十年,吃住简陋,寄人篱下,却从无怨怒。杜衍不好酒,即便有客造访,也只是“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简简单单,丝毫没有玉食笙歌的做派。杜衍一向为人低调,退休后的他,更是朴实如田夫野老,有人劝他着军士服,他却说:“老而退休,哪能以高士自居呀!”他或出游,或读书,或吟诗,还开始练习草书,追求精神的丰满,不追求物质的奢华,过着清贫自乐的生活。

然而,低调做人的杜衍,在退休的日子里却发生了两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据宋人朱或《萍洲可谈》记载,一次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举行宴会,作为退居二线的老领导,杜衍应邀出席。酒席筵前,习惯于不事冠带的杜衍,戴着居家便帽,穿着深色便装,端坐一隅,默不作声。

事也凑巧,河南府尹有事出去一会儿,府里的差役又不认识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老宰相,这时,门口的差役报路运勾到。当时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河南府属东京西北路,运勾是“转运使司勾当公事”职务的简称,为东京西北路转运使司属官,相当于财政或税务厅领导,官不大,实权大。于是,大家纷纷起身,向这位财神爷打招呼、套近乎。

运勾是个年轻人,靠长辈的恩荫当上了转运使司官员,年少得志,职务不大脾气却不小,见一糟老头既不躬身也不作揖,像钉子一样钉在凳子上不动,不禁火冒三丈,厉声问道:“足下前任甚处?”杜衍头也不抬,轻声回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年轻的官员顿时面红耳赤、呆若木鸡。

还有一次,一位名列前茅的新科进士,被朝廷安排到边关出任副职,路经应天府,知府王举正得知他才华出众、年少登科,估计前途无量,便把府里那些“牙兵宝眷”全部安排出来,为这位新贵警卫开路。应天府的街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只见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场面盛大,引得老百姓驻足围观,纷纷猜测这是哪位朝廷要员来视察呢。

正好杜衍出门归来,与新贵的队伍狭路相逢,无路可避,杜衍便拉下帽檐,拉起衣领,放慢脚步,靠边让路。两个仆人也拉住马,停于路旁。然而,新贵却因杜衍一行没有下马而十分恼怒,没好气地问身边的随从:“这是谁呀?随从回答,这是退休宰相杜大师啊……”

杜衍在回车院十年,最后逝于此处,可谓低调开始,清苦至终。据《宋史·杜衍传》记载,杜衍去世前留下遗嘱,嘱咐儿子们在自己死后不得铺张浪费,仅以一枕一席,低小的坟墓安葬。虽然位极人臣,杜衍将死之时还如此低调行事,无疑给那些一得志就忘形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支吾”为何形容说话含混

许晖

以“支吾”为核,产生了一大批词汇:支支吾吾,吱吱唔唔,左支右吾,抵梧。这些词现在常用的义项是形容说话含混、躲躲闪闪、闪烁其词、搪塞、不敢说个利落话。这种种义项是怎样形成的呢?过程非常有趣。

其实,“支吾”最早的原型写作“枝梧”,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秦国攻打赵国,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前去救赵。不料宋义按兵不动,项羽气愤之下,砍下宋义的人头,对众将称宋义与齐国联合,意欲谋杀,楚怀王暗中命令自己杀了宋义。“当时是,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臣瓚注解道:“小柱为枝,邪柱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邪”通“斜”。支撑屋子的小柱子叫“枝”,小柱子旁边,与“枝”一起起辅助作用的斜柱子叫“梧”,单独的“枝”或“梧”都不足以支撑,必须合二为一才能起到支撑作用,因此“枝梧”连用,表示支撑、支持之意,引申为抗拒。项羽杀了宋义,诸将慑于项羽的霸气,谁都不敢抗拒。这就是“枝梧”一词的来历。

但是,“枝梧”或者“支吾”又是怎么演变成说话含混的“支支吾吾”或者“吱吱唔唔”的呢?还是来看“枝梧”这个原始形态。前面说过,单独的“枝”不能自支,无法起到支撑作用,也就是说二者都不能自主,说话含混、躲躲闪闪的样子跟这种无法自主的形态是多么相像啊!因此人们就把“支吾”跟吞吞吐吐说话的样子联想到一起,又生发出叠字的“支支吾吾”和“吱吱唔唔”来。实在是太形象啦!

“左支右吾”意为左右抵拒,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也是由此而来。据《宋史·李昉传》载,李昉是宋高宗的大臣,曾为高宗指点天下大势,其中建议“由登、莱、淮、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汉、沔、江、池,以出吾右,一处支支则天去矣,愿预讲左右支吾之策”。结果高宗没听他的,倒是流传下来了“左支右吾”这个成语;左边要用“枝”,右边要用“梧”,闹得手忙脚乱,一处支撑不住房屋就要倒塌,狼狽之状可以想见。

至于“抵梧”这个词,是矛盾、抵触之意,原本写作“抵梧”,“抵”是木头的根,“梧”要斜着把这个根给紧紧抵住,于是引申出抵触之意。

教育记者报道要客观真实

邓颖超曾经为《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用眼、用耳、用脑、用笔,实事求是的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还谦虚地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邓颖超的这一题词很有针对性,无疑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亲切教导。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邓颖超戴上老花镜,非常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菊花能盛开吗?”

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颖超边说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看,“你说得没错吧?”

记者连忙红着脸点头称是,暗暗钦佩:她的头脑是如此睿智,眼睛又是如此犀利!真是一针见血啊。

拒绝树碑立传

1976年2月22日,正在访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特地拜访邓颖超。尼克松说:“我正在想如何才能正确地纪念周总理。我相信他不会喜欢建立一个巨大人像或造一所纪念馆。他要的是无形的建筑,这比有形的建筑更强大。”邓颖超说:“纪念周总理,不需立纪念碑,搞什么仪式。我们现在见面,对周总理最好的纪念是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连绵不断继续发展。”

对故居复原力求实事求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要求淮安县委将旧居处理掉。

1960年年初,淮安县委负责人刘秉衡赴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家乡的生产建设以及人民生活等情况。3月23日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临时寓所接见,其间,对故居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再次严肃交代:“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如果有人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我家的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者做生产车间都可以。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要影响机耕,上面还可以种树、种庄稼。”

次日,忙于会议的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宴请家乡来客,也就是四菜一汤。就餐期间,邓颖超担心刘秉衡在周恩来要求处理淮安旧居和祖坟问题上想不通,便耐心交代,反复讲道理:“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随后,她又风趣地说:“在处理旧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唱妇随’,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1982年,邓颖超在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时,让其向有关方面转达意见:“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

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写的。”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周恩来年谱和传记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有关邓颖超的资料,深感她作为杰出的妇女代表,其可歌可泣的历史值得专门写一写。当向邓颖超征求意见时,她严肃认真地给有关领导去信婉拒了。

据李琦回忆说:“她一向不同意宣传她自己,反而反对为她树碑立传。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你们需要她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

直到1988年党中央批准为她写传的任务时,邓颖超才表示:既然组织上做出决定,只好服从。可她仍然不是很情愿,在谈到如何写她